

中國古代的謠言與讖語

【第三版】

栾保群 作品

《推背图》及其前后后

那些符合「天意」的预言

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到底有多准？



江苏凤凰文学艺术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栾保群 著

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谰语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谰语 / 栾保群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94-2211-8

I. ①中… II. ①栾… III. ①谣言—研究—中国—古
代 IV. ① D691.9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5180 号

书 名 中国古代的谣言与谰语

著 者 栾保群

责任编辑 黄孝阳 汪 旭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5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30.75

字 数 34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2211-8

定 价 7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三版前言

二十几年前，我在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的《纬书集成》的时候，为此书做了一个附录，收集了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预言，以印证纬书和讖书被禁毁之后，谣言和讖语依然在政治生活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另类武器。从此之后，我就留心于从古籍中搜集各种谣言和讖语，而我的好友吕宗力先生，则致力于谣讖的理论探讨。这种无须商定的分工，也体现在其他我们有共同兴趣的课题上。若干年后，宗力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写出了他“谣言”系列的第一本《汉代的谣言》，我的《古谣讖》搜辑也大体完成。

稍前，说来距今也有十多年了，一个书界的朋友找我给他写个供大众阅读的知识性小册子。因为当时正热心于谣讖的搜集，就从中选了一些，铺衍成篇，也就成了本书的前身。而当时《推背图》一类的“大预言”正泛滥于书摊，网络上也有不少根据《推背图》而“推”出的新预测。我选择这个题目，自然也有和这些朋友讨论的意思。

与一般的预言性歌谣相比，《推背图》等所谓“大预言”伪

造的痕迹最为明显，只要略有些历史知识和判断真伪的能力，就能看透它是后人伪造的。但在民众心目中它的权威性却胜过其他预言，讲起什么“天意”，只要一提是“《推背图》里说的”，好像就有了可信度。记得是在2000—2001年间，我和同学胡小伟先生正办着一个短命杂志，写了篇关于《推背图》之谜的文章，因此小伟介绍我认识了曾因《推背图》获罪的王学泰先生。聊到“文革”后期，特别是周恩来去世而邓小平随即下台之后，在民众的私下舆论中对“四人帮”恶行的声讨腾然而起，与此相应的也有一些以《推背图》为辞的“政治预言”。但真的细究起来，当时未必有人真见过《推背图》，当时流传出自《推背图》的话，后来我细检各种版本的《推背图》，里面一句也找不到。也就是说，人们打着《推背图》的名义造出了“预言”，不过是表达自己的愤懑和企盼而已。学泰和我都是不相信真有什么“预言”的，我们认为，“文革”后期的“预言”只是当时人民心声的一种曲折的表达形式。但预言是个双刃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就在“四人帮”垮台之后，社会上也流传过同情四人帮的“预言”，同样也说是出自《推背图》。

似乎是20世纪90年代初，各种版本的《推背图》已经陆续见于书摊，人们真正是“见怪不怪”，当然也不可能再编出什么话来冒充《推背图》了，可是有些年轻朋友还相信从《推背图》之类的东西可以找到对未来的“启示”。所以我在写这本小书的时候，就特意强调，形形色色的预言可以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但其中绝对没有什么“天意”，真正的“天意”就是“民心”。有位读者看了此书后，挖苦我说：“一看就知道是个老共产党员。”那么我就再重复一遍一个真正的“老共产党员”的话吧：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这次重印，我对全文做了修订，改正了一些错误字句，并把一篇关于《推背图》的旧文修改后附在书末。请大家指正批评。

栾保群

2018年4月15日

谣言和谶语都是古人对预言的一种称呼。如果是以民间谣、歌、谚的形式出现，则称作“谣言”，而如果这预言对统治者有利，他们就换个名，或是中性的“谶”，或是直白的“符命”“天命”；如果是不利于统治者的话，那自然就是“妖言”了。但名称虽然不同，它们的预言性质却没有区别，都是上天意志在人间的预警或预告。

“预言”就是天意在人间的传播，是上天对人间社会生活的一种干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理论基础上的“天人感应”学说。上帝是宇宙的主宰，最重要的是人世的主宰；帝王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是天帝之子，天帝时刻关心着他们对人间的治理。如果帝王所行不合天道，天帝就要向他们“示警”，用日月晕珥、星孛犯守的天文变化，用风雨旱涝、地震山崩的自然灾象，用牛生二头、狗出六足的怪异，用谣言谶语、天书石碣的预言来提醒人主，而这些不同灾异和现象都包含着不同的启示，人主就可以因此而明白自己的过失所在，及时改弦更张。如果人主不理睬上天一次次的示警，

而继续逆天悖道，那么上天就要考虑结束对人主的庇佑，安排新天子出世了。于是河出图，洛出书，天降甘露，地涌醴泉，形形色色的瑞应一股脑地出现，这是上天给新天子“受命”，即颁布君临天下的合法凭证了。而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凭证自然还是“预言”。

这种理论现在看来是有些可笑，但在专制政治的古代却有它的合理性。人间自从有了君主，他们就以“君权神授”自居，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上天的意旨，臣民们还有什么道理和他们讲？于是贤智之士只好用君主的靠山——上天来约束他们不要胡作非为了。帝王虽然是天之子，但并不是天的代言人，上天的意旨并不是通过天子的口来宣布，而是靠鬼神，靠天象，靠灾异，靠社会上出现的一些怪事、怪物甚至奇装异服，还有什么荧惑星下凡传播的童谣来普告天下。人间的皇帝既已至高无上，什么周公孔子八贤王，都奈何混蛋帝王不得，那就只好从天上给他们安排一个“太上皇”了。孟子呼吁的“民为重，君为轻”，几千年来的帝王至多在口头上说一说，心里却暗自冷笑。可是墨子说的“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却使大多数帝王不得不略有顾忌。到了董仲舒把“天人合一”思想正式学说化，那时的君权不仅是天授，而且还可以天取；不仅可以授予此，也可以授予彼，秦始皇式的“万世一系”梦想就更站不住脚了。

尽管老百姓没有多少人读过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但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却渗进了他们的血液之中。所以混蛋皇帝尽可不理睬上天的“示警”，忠臣诤臣们往往要搜集些灾异和谣言来警告他们，而权臣逆臣则悄悄地制造灾异和谣言来为自己打地盘。至于老百姓，只要还没有被圣经贤传驯化为奴才，就难免要

发泄一下对权势者的不满，形之于歌谣，播之于口耳，弄不好就成为“革命”（本篇所用的“革命”都是其本始含义“变革天命”，请勿误解）的先声。而不安分的“乱民”，更不会放弃对这一武器的利用，造出谣言谶语，“煽惑人心”，准备“革天命”，换江山。从陈胜的“篝火狐鸣”到后世的《推背图》之类，都是以预言为形式的“革命宣言”。所以历代封建专制政权对这种“革天命”的预言无不采取严厉禁止的态度。他们对预言的恐惧有时达到非常敏感的地步，于是文字狱就出现了。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去炮制对自己有利的预言。

说起中国古代的预言，人们就要想到“谶纬”。“谶纬”是纬书和图谶的合称，这两种东西性质虽然并不完全一样，但在历史上却遭受了共同的命运：禁毁。

纬书曾经在数百年间与五经并驾驱驰于中国思想、学术领域。在东汉时，朝廷上的疏奏章表，朝廷外的墓碣碑铭是动辄引纬的，那场面正如前些年的“言必称马列”，每篇文章不用上十几条语录就不成其文章一样。而纬书的品类多达数十种，篇幅多达数百万言，所谓儒生的“皓发穷经”，多半时间恐怕是耗费在汗牛充栋的纬书上。但是时过境迁，纬书到隋唐以降就成了灭绝的恐龙，只剩下片鳞只爪的化石了。这灭绝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统治者的禁毁。西晋初年曾经“禁星气谶纬之学”，但看来并不怎么凌厉。到了南北朝时，势不共天的南方萧梁和北方元魏却在禁毁谶纬上取得共识，满肚子佛经动不动就大发慈悲掉眼泪的梁武帝，和励精图治的北魏孝文帝一样，都把收藏“图谶秘纬”者“以大辟论”了。但南北分裂的局面对文化的专制实在不力，所以最后的收功还要等到全国的统一。纬书遭遇的最后一次浩劫是

隋炀帝的大手笔：“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此学！”

这些皇帝的禁绝纬书当然不是因为纬书的封建迷信，而是因为纬书中掺杂了大量的“谶”，而谶却是非常“政治性”的。皇帝们要禁绝不利于自己统治的谶，就用了“灭九族”法，把谶的近亲纬书也一起消灭了。中国统治者的眼里是从来没有所谓“纯学术”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纬书的灭绝是受了谶的“株连”。

从政治史的角度看，谶的地位和影响远远胜过纬。如果大家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自战国时（最早虽见于《左传》，但那究竟是战国时的书）就开始存在的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谣谶”，原来与中国两千年的政治斗争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有时竟能影响历史的进程！

大家熟知的陈胜、吴广的“篝火狐鸣”，“大楚兴，陈胜王”，是作为“革命”号召的“谶”，也就是当时大造的革命舆论。那谶是由陈胜和吴广编造的。但流亡于大泽中的无赖刘邦，一个人从大泽中出来，便对他的同伴们讲，自己如何斩了一条白蛇，然后又遇一老妪，哭云：“赤帝子杀了我儿白帝子。”这又何尝不是他自造的谶？但《史记》却没有明白揭出，也许太史公是用《陈涉世家》中的造假来对映《高祖本纪》的“天命”，让读者自己两相比照，从而悟出刘邦的把戏吧。司马迁是否有用这种“春秋笔法”的意思，这并不重要。但在中国历史中成百上千次大大小小的政权更替上，一向是“成者王侯败者贼”，于是陈胜一流的“谶”就是野心家本人的不轨，而刘邦一流的“谶”则成了上天的旨意。一个王朝兴起之后，陈胜一流的谶如果不被销

毁灭迹，也是会被当作逆贼的罪证的。所以一个王朝的衰落和一个王朝的兴起，总是伴随着造讖和禁讖的运动。

造讖，对于一个政治势力的最后成功也许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它最初兴起的时候却是成败攸关。可以想象，假如陈胜不搞“篝火狐鸣”“鱼腹丹书”那套把戏，大泽乡铤而走险的成功就很难说。此后天下群雄并起，究竟出现了多少讖，由于史书阙载，已无从知晓。但像“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类的话，肯定不会只是一种亡国遗民的诅咒。再对照王莽末年谣讖如潮的局面，秦末的谣讖想必不会只有存下来的那几条。

王莽由汉朝的大司马变成安汉公，再变为“假皇帝”，最后“即真”为真皇帝，建立了新朝，除了“人心厌汉”的大形势外，“符命”和“谣讖”也起了很大的舆论作用。可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到了王莽末年，由于改制失败而“人心思汉”的时候，各路英雄就也拿起“谣讖”这个武器来对付王莽，同时证明自己的“天命”。

最有名的是为刘秀做天子造舆论的“赤伏符”：“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后来成了光武帝的刘秀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军阀，他不但精通造有利于自己的讖，还精通曲解政敌的讖以为自己所用。这也是“以柔道取天下”之一例。这种阴柔的战术表现在他对讖的运用上，简直是出神入化。

成功或不成功的野心家们既然热心于用讖造革命舆论，政治权术中就又添了一手：用讖诬陷某人为野心家，以达到公报私仇的目的。北齐大将斛律光（字明月），就是那位用一曲“敕勒川，阴山下”鼓起士气转败为胜的大将斛律金（字金）的儿子，他精于武略，威震关西，屡次把北周杀得大败。北周名将韦孝宽忌其神

勇，便造了几条谶，然后派间谍把这些谶语散布到北齐都城。北齐朝廷中斛律光的政敌祖珽，也随着加油添薪，补充了几条，结果斛律光就成了“谋反”的叛逆，举族被戮，而不久北齐也就亡了国。记得吴晗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把这段历史写成了一篇极为悲壮的随笔，很是引起一些人的感慨，而后来也很是引起另一些人的“钻研”，铸成了吴晗的一条罪状。这种方法到后来更加花样翻新，但手续往往趋于简便。武则天的特务们要陷害某人，就先在他家里藏下违禁的谶纬书，然后抄家，抄出来就灭族。这方法为历代的特务沿用，很少不奏效的。

纬学虽然灭绝了，“谶学”却永远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历来的造反者也好，野心家也好，始终没有放弃“谶”这个舆论武器，而且愈演愈烈，从成篇累牍的《王子年歌》《郭文金雄记》《嵩高道士歌》《甲子歌》《孔子闭房记》，到图文并茂的《推背图》，以及多得可以专门编目的各种“宝卷”，都造了出来，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一大奇观。于是禁谶的手段自然也随之发展，禁毁的书目也随之扩大，由图谶扩大到一切有文字的东西，最大的“成就”便是清代以来的文字狱。而这又是“文化政治”的一大奇观：一些不安分的文人绞尽脑汁地在文章中“含沙射影”，一些要用人血染红顶子的文人处心积虑地从别人的诗文中挖掘可以锻炼成狱的素材，而另一些被吓昏的文人胆战心惊地检查自己的作品有没有容易被人“误读”的词句。

除了用谶来诬陷政敌之外，还可以用造谶来蛊惑、教唆政敌谋反，这一招虽然曲折一些，但更可以看出中国智谋的神用。像《聊斋志异·九山王》中那种先用符谶怂恿仇人造反，然后使仇人灭族的故事，在历史上也有实例。

在世道不济的时候，社会上总是要出现大量的谣讖，与“灾异”一起“代表上天”向统治者示警。“赤厄三七”（西汉元、成时讖），“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子遗”（东汉建安时荆州童谣），“草木萌芽，杀长沙”（西晋八王之乱时童谣），这样的谣言不能不使统治者悚然不安。为了安慰自己，稳定人心，统治者这时往往也要造出一些“吉讖”来对付这些“凶讖”。北宋灭亡后，新即位的南宋高宗赵构一路南奔，一听说某个人的名字吉祥些，就像在洪水中见到根稻草，总要把它附会成讖，为跟随自己的残兵败将打气。

中国的文字自有其神妙之处，只是一个字，也能从形、音、义上随意发挥，说它是吉就是吉，说它是凶就是凶。字形可以象形、会意、拆散拼合，字音可以谐音、转韵，再加上方言、别字，字义上，中国的单字本来就是一词多义，再加上字的偏旁部首，互相通假，从这几个方面下手，就没有一个字不能被随意附会的。举个例子：明朝灭亡之后，明朝的遗臣和农民政权扶立明宗室建立了几个小朝廷，坚持抗清。一个是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的政权，一个是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的政权，一个是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的政权，一个是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的政权，一个是唐王之弟朱聿键在广州的政权。这几个皇帝或代理皇帝的寿命都不长，奇怪的是，鲁王以海最终亡于海上，聿键亡于福建，由榔亡于夜郎，聿键亡于南粤——他们的名字竟然预示了他们灭亡的地名！

迷信的人可以把这看成是天意，不迷信的人会说这是巧合，但如果仔细一分析，却不过是利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而进行的附会。我们只以鲁王朱以海为例，他死于台湾，台湾旧属福建，福建又称闽，也可称越，台湾为岛，岛可叫屿，岛在海上，海也

可叫洋……这样串下去，能和台湾连在一起的词汇将有很多，所以鲁王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有可能把他与台湾联系起来。而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即不管朱以海死在哪里，南七北六十三省，他随便选个地方驾崩，我们也都能与他的名字挂上钩。当然这要有会扇忽的本领，比如朱聿键本来是被捉于缅甸，被杀于云南，虽然与粤相近，但究竟差之千里，可是都在中国的大西南，一扇忽也就能蒙混过去了。

一个字可以如此随意附会，如果再把字缀成词，再编成歌谣，用上古代的修辞学、占卜术，那就能把任何民谣或随便一句流行语都演绎成预言了。但我们不想“造谣”，所以也没必要鼓捣这些文字把戏。

当然也不能排除历史上的巧合，比如北京的前三门，中间是正阳门，东边是崇文门，西边是宣武门，凑巧的是，在北京建都的最后三个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元是至正，明是崇祯，清是宣统，各占了前三门的一个字。再找个时间近些的说，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即将正式开场，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而到了1976年，“大革命”即将收摊时，河北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后来我在整理河北地方志时，忽然发现，邢台地震的中心隆尧县，在民国十四年之前的旧名正是“唐山县”，只是京东唐山镇因为产煤而名气大起来，才把唐山一名让了出来，改名尧山，而到了1949年之后，又与隆平合并为隆尧。“文化大革命”一头一尾的两场大地震，竟然全是发生在“唐山”，而海外客们不是也把中国叫“唐山”么！这可以看成巧合，也可以看成“天意”，但即使是“天意”，这老天爷折腾死那么多人，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你警告张三不要跳河，总不能把李

四他们的船掀翻了吧。

前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关于“预言”的书，诸如翻印的《推背图》以及《预言成真》之类，不管编者加进多少现代化的解释，但总的目的是让读者相信这些预言真实可靠，冥冥之中确有什么主宰。这倒也没什么，事关书的销路，总是要有它的卖点，其实作者本人也未必是真信的。只是有些年轻人一面享用着现代科技的便利，一面却相信所谓“大预言”的预测，这才是可悲的。那些预言究竟是“天赐”的还是人造的，它们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对现代读者来说，本来只要动一动脑筋，就会明白的。我只质疑一点，“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华民族空前的浩劫，不仅是人死了千百万，而且几乎灭绝了五千年的优秀中华文明，却让最腐朽阴暗的部分急剧膨胀成一个大怪胎、大妖孽，为什么《推背图》《烧饼歌》里连个供人牵强附会的痕迹也找不到！

但由于这些“预言”涉及一些历史知识，如果不作一些介绍，仅靠表面现象和编造者貌似博学的“瞎忽悠”，确实有很大的迷惑性。所以我编了这本小册子，选了一部分有代表性的政治预言，并把它们的历史背景加以介绍，一方面是让读者知道中国的政治史中还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中国的文化史中还有这么一个怪异的门类，另一方面也希望读者知古以鉴今，古代的先哲在相信天帝和神明的前提下，尚且把“听于神”当成亡国和乱世之征，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科学与民主”的社会中相信什么天命，呼嗨什么救世主呢。

目 录

前 言	/ 01
-----	------

【周】

檠弧箕服，实亡周国	/ 001
鸛之鹄之，公出辱之	/ 004
火中成军，虢公其奔	/ 007
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	/ 009
后十四年，晋亦不昌	/ 012
秦与周，合而离	/ 015

【秦】

赵为号，秦为笑	/ 017
城门有血，陷没为湖	/ 019
亡秦者胡	/ 021
阿房阿房，亡始皇	/ 024
大楚兴，陈胜王	/ 028

【西汉】

宝文出，刘季握	/ 030
柏人者，迫于人也	/ 033
三七末世，九虎争帝	/ 037

公孙病已立	/ 040
灌玉堂，流金门	/ 043
皇孙死，燕啄屎	/ 045
邪径败良田	/ 047

【新】

刘秀发兵捕不道	/ 049
白水真人	/ 052
谐不谐，在赤眉	/ 054

【东汉】

见一蹇人，言欲上天	/ 056
八么子系，十二为期	/ 058
黄牛白腹	/ 060
彭亡	/ 062
车班班，入河间	/ 066
侯非侯，王非王	/ 069
董逃	/ 071

【三国·魏】

千里草，何青青	/ 073
代汉者，当涂高	/ 075
鬼在山，禾女运	/ 077
其奈汝曹何	/ 081
阿公阿公驾马车	/ 083
白马素羼西南驰	/ 085